

简论翻译研究方法的根源问题

---围绕“语言学”与“翻译学”之间的一场争议

حول المشكلة الجذرية في مبحث الترجمة
---بالنظر إلى النزاع بين "علم اللغة" و"علم الترجمة"

Dr. Mohsen Sayed Ferjani
Lecturer in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Faculty of Al- Alsun - Ain Shams University

أ.د/ محسن سيد فرجاني
مدرس ب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ألسن - جامعة عين شمس

On the problematic basi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ranslation-----Around the dispute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ology"

ABSTRACT:

The main topic of this thesis takes as its focal poin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creat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dispute between conceptual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conventional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linguistic field of study. The general analysis in this paper aims at review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under the restriction neede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status for its content. The researcher proposes a matrix of thoughts through which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s could be viewed from a well-established theoretical standpoint. Finally, the thesis is hoped to give insights into building a scientific concept for translation taking as its leading methodological tools the "Hypothetico deductive method" according to its defini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حول المشكلة الجذرية في مبحث الترجمة ---- بالنظر إلى النزاع بين "علم اللغة" و"علم الترجمة"

الملخص:

الموضوع الأساسي لهذه الورقة البحثية يعرض للمشكلة الجذرية المتعلقة بالتأصيل العلمي لدراسات الترجمة وعلاقة التنازع أو "التداخل" بينها وبين تطبيقات علم اللغة في الترجمة، فثمة تقاليد علمية تنظر لدراسات الترجمة باعتبارها جزءاً من المحتوى العام لتطبيقات علم اللغة، والهدف العام للبحث يتجه إلى تحليل صيغة "المكافئ الترجمي" ودراسة شروط تحقيقه بقواعد منتسبة إلى الدراسات اللغوية (تطبيقات علم اللغة في دراسات الترجمة، تحديداً) ضمن المحتوى العام لتصورات بناء "علم ترجمة" تقوم على: المدخل النظري، فالتطبيقات، فتاريخ الترجمة، وقد اعتمد الإطار التحليلي العام للبحث على استلهاً التحليل النقدي في "فلسفة العلوم" من زاوية التمييز بين ماهو علمي وما هو فلسفي في المحتوى العلمي لكل من "علم اللغة" وتصورات "علم الترجمة" على اعتبار أن تأصيل أساس علمي للترجمة يتطلب تحديد "الخاصية المنطقية المميزة للقضية العلمية في مبحث الترجمة" وذلك من حيث: دقة المضمون، وملاءمة المحتوى المعرفي، والتزود بالقدرة التفسيرية التنبؤية لعلم الترجمة، بما يمكن من استنباط قوانين عامة ذات قدرة تفسيرية قابلة للاختبار، والباحث يفترض في هذا الصدد تطبيق "المنهج الفرضي الاستنباطي" Hypothetico-deductive-method على علوم الترجمة.

简论翻译研究方法的根源问题

-----围绕“语言学”与“翻译学”之间的一场争议

关键词：语言学；翻译研究；假设演绎法；演绎推理；翻译学科基础

对于翻译这个话题，从历史角度看出现许多观点：起于“奥古斯丁”的一些神圣的言辞以及“西塞罗”流派，它们的始传者是“马克·昆未纳塔利言”，“最年轻的布莱恩”。从类别看，它在其发出的一些杰出的层面之间传承性的分配它的一些创作内容：

- 1, 从文学视角解决它的一些主题层面（自由转载和创作）。
- 2, 另一个层面是依靠实践语言学的一些基础（守规和特定的技艺）。

即使直到现代，翻译研究的基本入口也一直和那些古典的东西那么相近，假如你努力研究过古罗马的“直译”和“意译”两种的创作理念的话。因为当时十八世纪时的翻译中旨商讨围绕在“精细和守规翻译”以及“自由创作翻译”¹之间。不然，直到近代，翻译大多的一些主题也是围绕在两个基础点上：

- 1, 顺应时代发展的绝美和文学。
- 2, 关于翻译本身实质和翻译语言、艺术以及心理学方面特性的一些命题。正如法宰·阿推叶所总结的那样。²

这个就是以对亚里士多德的老对比发展出的方针的努力，它自神权时代起自然科学整顿的中断，并经过欧洲中世纪（阿拉伯文学力量的顶峰）直到新时代，然后它以明显的过分表现转向了力求欧洲中世纪实践稳定的佐证。对于新时代纯粹的实践，相对论纠正了它，为了切合当代假设演绎法方针的措词。*

假如当时的理论分析有抱负在那个有活力的模式里结晶出它的内容制式并稠化它，那么复合理论知识很少能校正它，它试图寻找合适的一些突破口，其中有，就像：

一，谨守当代科技和先进知识的一些条件。

二，尝试对翻译的主要命题实行语言意义的考量，并且侧重于在各语言和对每种语言特殊区域的影响之间的一些共同属性。（语言理论前言，依照法国学者乔治·莫南的说法）。

三，以为翻译放置理论看法为目标，为了检验翻译的各层次自然现象（描述性）以及研究实现它的一些条件。（理论努力 Catford“卡特福特”的语言比较学研究语录）³

四，语言翻译学入手，包括建立起语言翻译学科基础的综合的理论（依照俄罗斯学者 Barkotarov“巴尔胡达罗夫”在他的作品“语言和翻译”里的建议）。⁴

五，以把翻译研究分割成三大学科为目标入手，它们是：

1-一般翻译学科。

2-描述性翻译学科。

3-实践性翻译学科。（按照西方德国学者 H.Wilss“威尔斯”的考虑）。⁵

为翻译研究编辑三类，对此描述包含在：

1-翻译理论性。

2-翻译实践性。

3-翻译的历史。（按照在汉语研究中所确定的一些翻译内容）。⁶

至于最后的这个突破口，它是对于翻译命题在推测中最成熟和完美的方针性的著述。使我轻松的一些相关联的出处范围中有我把它当成为了反驳对翻译学科方针源泉努力的标准。（无论是我依靠了一个词就像基础类的心理学或者我用了把它称作初始的一类的明文，基本的标准是为了建立起方针研究。（西方德国学者 H.Wilss“

威尔斯”的言论)。我是以基本的假设为根本，它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三类著述的努力，把它认为是为了追述原本而付出的典范，就像为了学术研究把理论认为是一种方针突破口的好借口。这个努力需要追寻正确的必须的翻译学科被要求的一些条件，它以紧跟随对现代知识的描述为目标。

我将持续研究假设演绎法的方针，从假设转移到注意的现实，然后转移到演绎结果，以收获共同的知识为工具，对部分不同种类的翻译研究之余为了实践对哲学的一些理解。

第一处：翻译的理论性

在前面的三类编辑中（理论-实践-历史）理论在它的一些范畴中包含翻译的原本和标准以及对翻译行为的解释。翻译中的现代理论往往需要准备语言学、关系学、文学、艺术学，它接受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些成果以及所有以此建立起来的解释翻译表面的成果，由此能帮助指导翻译实践的机制。在这个理论的内容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几乎和语言学在同一个范畴层面上，“按照微观语言学，它的传统的分类是：声音、就像一些单词，命题，语言历史学研究，形容性，历史和类别比较研究，或者以它的宏观意义：语言心理学、社会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理论学和实践学（教育学、传媒学）为了包含在实践语言学科里面。”⁷

事实上，为翻译命题取出其语言性，当时就发生在翻译理论的腹地，甚至在美国人尤金奈达尝试为它建立理论之前，但对它所用的一些引言属于丰富种类，且依靠的是语言的级别(狭义)很少有超越它的。“问题是语言性的内容轴心是同时为了语言和翻译，它总是徘徊在“根本明文”和“目标明文”的关系之间，并没有为了语言在局限狭窄的持续环境中而离开职责性的方面。”⁸一些欧洲语言痴于要求各自的构造独立性，制定心理学的表达方式。（希腊语和拉丁语在一些科学和欧洲书籍的影响仍然很明显），所以德国思潮以翻译语言转到了新的一片天地，致力于民族语言的发展。语言环境本身的实质就有要翻译的明文的语言是清晰能懂的。然后理性方面出现了

，它号召语言的表述方式与思想和实际联系起来。随后它与侧重于在语言中情感印象方面的罗曼蒂克思潮矛盾了。到此地步，语言以其丰富的内涵走向翻译的理论性，甚至好像**开始**为它延伸生命力。甚至 Catford “卡特福德”直白的肯定了“任何检验或者对翻译行为的描述必须从为编撰和放置语言的一些部门中获取最大的益处，所以翻译应该依靠语言的理论性”，甚至理论几乎一道释放在各类知识的广袤田野里：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语言学的利器回归了，它在挑战其能量。但是，因为它的知识性的编排，包含方针性的一些工作迷惑了，那是因为**在什么是“语言性”和“翻译性”之间的富有特性的一些研究途径的逻辑学规则**介入了，“翻译的自身主题内部，并没有出现一些明确的代替不同部门的道路。”⁹所以当费奥多罗夫安定自信的说“深邃的语言性在解决两种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中的介入，它是能够独自承担起保证翻译能免于技术性的一些错误。就是说翻译的理论性的努力，局限在语言的方针中，它以翻译学科编著的复杂性而增加，就这样在理论性的理解领域和践行的一些方式以及它的完美的实践性之间融合决断的这个分界线。正确的是**各种各样**的行为事实容许研究道路和执行的方式的不同，不只是从一种知识到另一种知识，而且在一种知识的内部也是不同的，每一种研究学科和不同的部门一直都有其独立性、类别性和自然性。有时候，一个研究课题的内部会出现它的一些特性以及强调它的不同。

如果翻译中的理论性在有关联的知识领域承担和要求丰富完美的竞争，那么就让我们试试哲学知识的理论，以整体的能够解决从一些知识立场中分离出公共原则的研究的这种描述，为了达到一些适合实践在每一个知识性的研究上的基础，只因为它是知识性的。

那么，它就是被看到的“知识的逻辑”，它不从一些知识的完成方面去研究，而从具有真知、包含陈述性的逻辑构造方面去研究，它当时只以包含丰富多彩的理论本质而翻译，自起初就以一些知识话语为工具，而不是以一些专业人士，那是因为一个专业学者会被禁锢在一个有限的领域，他不能解明一种知识在其不同领域之间的

一些综合纽带，同时一些知识有必要在其方针内纵横交错，那么必须有一个在一种知识里不是专业的人，以便他因为不同的学者们在他们各色领域内所遵循的一些方针去尝试稳固它，“从而为这些知识方针总结出一些普遍的范例。”¹⁰ 他也去面向诸如一件全面的事情，直到在获取知识本质中为一些方针放置一个总体全面的形象，这个人他只能是位逻辑者，因为他能够独自在一个全面的视角里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整合，他能做得到在一种知识的各类分系里感知普遍的一些风貌和一些总体的、在相随的一些方针之间共有的特性。

这里，我仅局限于对翻译学科从哲学知识方面阐述两类：

- 1- 按照知识主题的不同，思想性研究不同的方针。
- 2- 受识的理论，尤其在确立知识的价值和界限的估量点评方面，以它能够在不同知识使用的一些特殊途径中发出一些增强型的判例，这个是标准型的逻辑，它能够为付出努力的理智掌握一些相遇的方向并且使其优劣排序。

是的，它没有使翻译学科受益，它致力于方针上的成熟，像编排知识是独立的，能够粘连很多，但是你回到语言学视野，它是原本是新生的，它关联着它的一些理论性的理解和一些杰出的研究途径，它中和了包含有的人文学的危机，知识的属性几乎因此而泯灭，因为英国学者 G.Steiner“乔治·斯坦纳”在学习翻译者之间激起了广泛回响的程度，当时他在其著作“翻译和语言之间”（1975）妄称翻译有两个标志：第一个语义学转移，第二个语言层次转移，然后他强调其完全归属于语言方面，并把它知识性地剖析出来，以他的原话：翻译的理论性不能够独自存在，它只是语言理论的一部分，这个就说明了语言的一些研究没有也“绝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它只是一种艺术。”¹¹

或许翻译所陷入的最坏的困境是它在把一些理论当作工具中和语言学的一些领会相关联了，这个因为不能完善它和减缓其发展速度而完全地招来了一些人文科学的问题。譬如，翻译在执行中有非常惊人的实践财富，它没有在其的一些理论理解中按照合适的方式

去利用，所以，它没有深入其中，仅仅达到知识性的一些演绎注释的形成（通法和原则条款）。然后它的问题和一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在其无能达到受论注释的阶段中**开始并驾齐驱**，它需要确立严格的逻辑性。没有任何一个词比“理论”这个词用在人文科学里更壮观和伟大了，但是理论是什么？其实理论就是解释表象，所有无关解释的东西都不应该称作“理论”。

第二处：翻译的实践

它固守去分析“本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一些语言流派的不同，研究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的两种工作，设法到达校对一些翻译的工作并且对它们进行注解。

按照这方面的定义，它对翻译科目认识性整顿的形成毫无裨益。（注意我们的主题是“知识逻辑”而不是它的实际完成数量）为什么？因为探究、分析和设法到达这所有的描述性的附属项不能建立起解决和修正源本的工作的证据，假如存在就像这样的修正，也不过问文化之上的交流，且之后严厉地和它的一些理论性的理解分离，为了局限于纯粹地“符号交流”，沉迷于描述的汪洋大海之中。这部分被理解为它代表边侧的包含它的一些隶属于因为一些不同程序的主题且以它的卓越实践性的一些途径引导的一个分支，尤其它出色地代表着“经验”这方面，或许因为所说的“完美的知识”主题方面它是同等的，所以它是绝无仅有的。首先，它能够以它的惊人的在翻译训练期间重复在长期范围内的观察力满足，并且还以组成它的剖析其表象的一些特性，照看它的内部必须的一些关系以及联系它的一些内容和要素而满足，其指的就是固定它的描述性的一些规则。其次，它也能够按照使它安心的正确的方针指导自身的一些实践（那是它的第一本性和优秀的属性），“在服从实践的测试之后，它为其界定了一些去除项和相对注解和总括以知识的工具所装备的理论性理解。”¹²或许它是多余的奢望，正如稍后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理论在任何一种知识里都没有就像理论给予翻译那样把它自身完全地给予实践的一些机制，甚至在一些自然科学里（它一直是典范和最高级的例子，至少在所说的把人类回归到严格的物理模式的激进方针中）我说，甚至在一些自然科学里，粗略的一致性理论和实践以及理论物理和实践物理之间的总则，前者为后者规划线路和界定其框架，后者则承担前者的实验、标准和证据。但是理论的固执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当古典理论物理仍然以“教条的”固执在实验面前对米尔克森/科利反驳以太的一些结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及和菲茨杰拉德、洛伦兹等等的一些较量，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面前这个领域在非常晚的时候发出了一声伟大的回复。

翻译的理论有时候几乎变成包含在实践部分结构的微量原子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在这里致力于测试它的，甚至当时著名的俄罗斯语言学家费奥多罗夫把整个翻译学科的目标局限在一点上，它就是揭示在原文和它的翻译之间的一些控制点。（注意明显的指向实践的付出）发布一些或许能够从部分翻译情况研究中总结出的结果，另外指导在翻译中行为的实践，因为有可能在寻找必须改变的一些道路中需要翻译理论的指示，“从中得益的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翻译的一些问题的明证和调查证据”。

就这样，翻译的完整主题仅为实践目的而述职（实践终极），而没有解明如何调查那些证据和明证，还有种类、重要性、本质以及构架致力于解决的翻译的一些问题（理论终极，正如它是明显的），但是那些界定是折磨整个人文科学逻辑大厦的刀刃，所以它尝试完全顺服于古典实践科学的原则，以超级的热情在创新的知识自然结果上延伸出极端的经验主义，最后，它过多的重视实践的一些结果，使它长时间的停留在忠于一些程序性的技艺的界限跟前而没有发展到注释性阶段，仅满足于描述，它可能在理论和实践方向之间以它的过分的矛盾重复一些人文科学注释的错误，导致在它面前助长减慢可发展的速度。

如果把一些分析归于人文科学退后的问题，把自然科学归于它不能到达注释的阶段，把它局限在描述性的阶段上，这个是数量巨大的正确，而且一些具有地位的专业人士的证词强调着这个，用其语言 Ipsi Dixit 说它——按照著名的拉丁文表述——这个人就是伐宰·阿推叶博士，他强调...“翻译学科的内容包括翻译，就像表象它通常有其本质和一些规则...这个学科的基础是描述性的，就是说为把源语言转移到翻译语言的行为，用分析和提示描述相应必定事项的研究”。

13

或许翻译的实践历经时光到使它合格的阶段完成了巨大的收获，它用描述的一些方针武装起来，统计提供科学性的一些描述条件，但是它需要去指定一些注释标准（以整体的一些条件和命题）很多都远离它而没有这样做。

然后，它没有以衍生其不同知识的领域和理论的接受者相互作用，它把主导交付于精细狭隘的专业，当时费奥多罗夫以侧重于纯粹的实践而开始的道路应该在斯米尔诺夫托利安斯基的手上引导去做一些围绕翻译工具的研究，为了单方面放弃理论，他忙于为翻译使用运行工具，翻译的同等问题一直以特有形式持续在翻译实践和文学翻译的命题中心，为注释关联着没有解决或者责成的演绎和一些方针。

第三处：翻译的历史

它设法以在其中的翻译文件资料、翻译组织和机构以及翻译者协会去分析完成的翻译活动，它的最崇高的目标是从两方面期待处理翻译文化史的材料：

- 1— 社会背景。
- 2— 文化交流的要素。

这样就同文化的一些主题（语言，思想历史，哲学）和社会以及历史的一些主题（通过在一些大型思想活动和文化趋势中调查翻译的一些影响）而完善它。

那里有一部典型的为研究这种分类的门路提供建议的著作，以便按照这些要点处理其主题：

- 1—翻译文化史（本土的，在一个国家或地区）
- 2—翻译文化世界史
- 3—翻译文化比较史

前两个是垂直描述，第三个是水平描述。

第一点：这里，在对历史主题材料的典型的一些分类面前，它没有剥夺从事翻译研究的途径，假如有，以鼓励符合其的不同知识的立场，以免和整个历史主题进入相同的身份。

第二点：它为时尚早，在翻译研究的框架直至前两部分方面里，期待为这部分去确立**关键逻辑**的构造，这个首先归于：和翻译的历史学科有联系的工作的稀少，（只有七本书在以中国体积的国家里和只有一本书在日本!于 1959 设置题目为“明治时期的翻译历史”）除此之外，为翻译历史的研究的付出重视方针源泉，它在八十年代后期才出现，因为以需要形成一个具有明确科学的标准自我形象意识的成熟，鉴于它的表象以及只能通过远见领域解决的结构特性的复杂程度，这个是按照国际翻译联合会 FIT 的建议，它号召进行专业性选择性的历史翻译研究工作，不仅仅是普遍全面的一些研究。

“90 年代初，国际译联（FIT）组织开展了一项翻译史研究项目。这一个项目由金·迪利尔（Jean Delisle）和朱迪·伍兹沃思（Judith Woodsworth）负责，她们分任该项目委员会的正副主任。该项目却定要**进行有选择的、专题性翻译史研究，而不是综合性的详尽的翻译史研究。**”¹⁴

但是，在总体的翻译研究框架里结合翻译历史研究学科，凭着大胆的假设和坚守它的普遍的条件和总体的命题，它大多不助于对表象的分析和考量各部分之间正常的**关系**而不去考虑以下的一系列条件：

1—“恢复的”历史方针的本性，因为求证的方针适合于它，能够在历史资料和历史事件之间安全地穿越久远，它俩是历史研究的首要的两个要素。

2—对于不同的研究途径稳固方针：实践的、求证的和恢复的其中有特殊性的，为了萃取出一个能够总体感知的普遍范例以便在翻译领域的“翻译历史”篇章中保持收获真相，假如那你发现的话，这个是为了在翻译领域感知一般特征和一些后续笼统的方针之间共有的一些整体的特性，同时在一个总方针里以它的不同的一些**步骤**的形容而**关注完善它**，这个是按照在有时候需要类似学科方针的普遍看法。所以按照正常情况，研究途径和它的程序方式以及经验技术必须从一种**知识**到一种知识必须不同，而且在同一种知识内部也是不尽相同，第一：取决于它发展的程度。第二：取决于它处理其主题的程度和角度，按照这些不同的程序，一些专家和学者们树立起重视这种专业的现象，一些科学显现出相连不同科学的分支的研究方针，和研究主题以及从一种知识到另一种知识不同的科目一起解决经验方式和适应专业的一些途径。

从这一切我们在最终的结果总结出翻译主题中所提出的**三种**分类：“理论、实践、历史”就像凭借为其主题追述知识源泉的目的成为方针入口的理由，它从哲学科学方面失去正确必要的一些条件，被要求去塑造逻辑或者知识的内容以及适合它的（服从于否认和稳固实践的）消息内容，假如你遇到的话，为了具有测试其假设的方针程序途径的权利，也为了达到一些原则条件和总体的命题。

假如哲学科学一定是逻辑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实践专注于知识的评论分析，以其基本的提问：知识怎么会成为可能的？（体育怎么会成为可能的？...等等）它以其确立人类学识价值的评估和不同道路的适应程度以及**各种科学所使用的程序方法**掌控发出评判价值的标准。

翻译主题的问题它本身也是要求在牵挂认知内容的知识性和属于意识形态或者哲学或者推倒的一些流行的意见的非知识性之间区

分开来的人文科学问题的一部分，从中它要求在它是知识性和非知识性的区分之间限定逻辑的标准。就是用杰出的神学家卡尔波普尔 K.Popper 的话：限定科学命题的优秀特殊的逻辑，这样使知识成为知识，而不是它的语言或者结果，而且它的目标和实现它的方式谨遵面向实践的事实。正确的是对知识术语的精确理解是围绕它的消息内容的精确和其知识的内容以及它的注释和预测的能力的众多问题的影响。然后反对以对比意义和预测能力的精确一些意见出现了，它提出另外一个证据是对于精确正确的含义是它能够塑造包含从变量中抽象结构的一些范例的格式，它允许以特定的一些纽带演绎所有特殊的命题，之后就像这一些格式在许多自然科学中是没有的。所以精确的属性不归于所有的自然科学，也不脱离所有的人文科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等等）。

但是这个限定，它以逻辑的演绎联系严格的数学演绎的天秤大多不会破坏科学的标准，也无济于关于总命题也就是必要的一些总则的缺失，为了演绎所有的状况，无论它是实用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就像尽管提供翻译的实践内容，但是它没有发展到相对于在实践事实面前顺服的具有注释能力的总则。为了服从测试它的一些途径，这样就知道所有的否定逻辑的标志：就像否定、促进的判例和它的等级，实践内容的一些标准，绝对和相对逻辑，肯定和否定内容，这一切依靠于演绎，尽管狄尔泰（W.Dilthy 威廉·狄尔泰 1838—1911）* 的努力，他致力于尽可能面向系统的和方针性的创建人文学，但是他没能超越在它和人文学科之间树立起的一些主题性的区别，所以首要的实质是按照社会或者文化前后衔接的模式和历史节奏相对的改变，直到这个结果达到了影响历史的研究，它的一些学习者开始在他们的研究中解决落实科学的属性，这也许是研究翻译主题的人迫切的一件事，无论在其历史的一半中或者理论中。

[فوزي عطية. علم الترجمة. القاهرة: دار الثقافة الجديدة، ١٩٨٠.]

- ¹ 穆雷，从接受理论看习语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中国翻译，第4期 1990年，13页。
- ² 法宰·阿推叶《翻译学》，新文化出版社，1980年，55-56页。
[فوزي عطية، علم الترجمة، (القاهرة: دار الثقافة الجديدة، ١٩٨٠)، ص ٥٥-٥٦.]
- ³ 假设演绎法 (Hypothetico-deductive-method) 又称为说演绎法，是指在观察和分析基础上提出问题以后，通过推理和想象提出解释问题的假说，根据假说进行演绎推理，再通过实验检验演绎推理的结论。
- ⁴ 同上，65页。
- ⁵ 穆雷，从接受理论看习语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中国翻译，第4期 1990年，38页。
- ⁶ 同上，38页。
- ⁷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页 2。
- ⁸ 同上，页 2。
- ⁹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蔡毅等编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页19。
- ¹⁰ 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穆雷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年，页 0。
- ¹¹ 阿卜杜·拉赫曼·巴答威《科学研究方法》，科威特出版社，1977年，9页。
[عبد الرحمن بدوي، منهج البحث العلمي، الكويت ١٩٩٧، ص ٩]
- ¹² 罗进德，“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中国翻译)，中国国际书店，第一期1988年，页 8。
- ¹³ 法宰·阿推叶《翻译学》，新文化出版社，1980年，58页。
- ¹⁴ 同上，70页。
- ¹⁵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2。
- ¹⁶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在十九世纪末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 (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 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一词，从此就叫了开去。

参考文献

-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 穆雷.从接受理论看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中国翻译),第4期,1995.
- [3]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4]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5] 陈建民,"文化语言学说略".(语文导报)1987年,第6期.
- [6]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 [7]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8] 罗进德,"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 (中国翻译),中国国际书店,第一期,1998.
- [9]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 [10] 王宁、[美]杰拉尔德·厄尔利.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11]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 [12] 阿卜杜·拉赫曼·巴达威.科学研究方法.科威特:科威特出版社,1977.
- [.۱۹۷۷] عبد الرحمن بدوي. مناهج البحث العلمي. الكويت: وكالة المطبوعات بالكويت،
- [13] 法宰·阿推叶.翻译学.开罗:新文化出版社,1980.